

审判信息的边界

多想一点

边界或许不应是静态的线状,而应随阶段变化。从长远看,问题所涉及的,不仅是司法技术,还包括制度经验:在不确定与可理解之间,社会——请注意是社会——怎样划定可接受的边界

刘星

审判信息边界问题,颇引人关注。围绕这一议题,长期存在两种看似对立的观点:其一,审判相关信息应当保持必要保密,防范外界不当干预;其二,相关信息理应充分公开,回应公众知情权与监督诉求。两种主张各有依据,也各自伴随潜在风险。这样的分歧客观真实,也精准触及议题核心。

不过,细心留意便能发现,讨论的关键并非简单权衡保密与公开各自的利弊、风险,而是在什么诉讼阶段、以何种方式划定信息边界。议题重心不在于“为何保密、为何公开”,也不在于二者选择本身有多棘手,而在于公开与保密从何时启动、到何处终止。一份判决引发舆论争议,矛盾往往不只存在于裁判结论本身,更多源于大众对裁判的解读差异。而理解的分歧,有时来自价值判断,但更常来自信息的分布方式——谁知道、何时知道、怎样知道。

依此而言,一个看似技术性的议题就非常重要了:审判信息的边界,应如何划定?

边界收缩

在经验层面,认为信息边界应充分敞开,并不理所当然。在诸如裁判合议、审议的阶段,收缩信息边界,本身就是程序制度理性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
不妨设想这样一种场景:原告起诉,被告应诉,双方围绕案件事实与法律适用展开攻防。此时可以注意,法院的审判倾向如果过早显露——例如,对某类证据更偏好,对某种法律解释更认可,那么对当事人的行为会产生“吸引”作用。当事人的行动路径,会出现“相机行事”的特征。这种反应,时常不是围绕“更好地呈现事实”。相反,它更可能转向如何贴近法

院

的判断习惯。具体来说,原告可能思考,要调整诉讼请求的方案。被告可能琢磨,要强化某些更易被接受的抗辩,还要弱化那些虽更接近事实,却不易被采纳的陈述。结果则是,诉讼逐渐从围绕规则与事实的“竞争”,滑向围绕裁判者偏好的“揣测”。

在这种情景中,信息边界的收缩是一种有意的约束。它使当事人“相机行事”变得难以实现。他们因此被迫更多依赖既有规则,并遵从事实展开论证,而不是围绕尚未明朗的审判倾向进行策略性的布局。也因此,这一阶段的“保密”,不是缺陷,而是一类制度设计结构。它试图保留程序中的不确定性,防止竞争偏离“正道”。

边界敞开

上述收缩,不能延续到裁判形成之后。当案件判断趋于完成,裁决将不再只是当事人之间的终局安排,它同时承担了对外说明理由的功能。在此阶段,信息边界需要敞开。

我们都能明白,如果裁判仅以结论形式呈现,没有对当事人主张与抗辩的充分展示,当事人会对裁判逻辑存有疑问,公众通常也难以理解裁判的合理性。所以,“公开”不仅是给出结论,更是展示路径。

这一路径应尽可能传递审判思路的主要信息。比如,各方主张、证据认定,以及法院的裁断依据。通过这种对照式展示,外部观察者能看到:一主张为何成立,一主张为何失败。裁判的说服力,在这类结构中逐渐生成。

在这个阶段,信息边界的敞开直接关联司法公信力。没有路径的展示,结论易被理解为随意;展示出来,结论才可能被理解为牢固。

边界敞开的成本

边界的敞开并非只有收益没有代价,需要注意三类成本。

首先,是表达成本。当事人的诉请与抗辩,一般来说层次繁复。其中事实链条交错,法律主张递进。法院若尝试完整呈现,很难保持简练。

其次,是理解成本。公众与专业法律人不同,面对大量细节信息,公众阅读与理解负担显著增加。信息越充分,他们未必越易理解。

再者,是评判成本。信息结构复杂时,外部评价所需的认知投入也随之提高。原本可直觉判断的行为,现在需要经过更细致的分析才有可能形成。

面对这种情形,看似合理的一个主张会自然

出现——既然边界敞开带来成本,是否应当重新收缩?例如,对当事人的部分论证不再铺开,仅呈现法院的核心理由,不好吗?

然而,这个主张很可能会遭遇进一步的追问:以“降低成本”为理由的收缩,是否真的降低了系统性成本?我们不难看到,当信息被压缩甚至被遮蔽时,当事人与公众一般不会停止判断。他们很可能转向另一种路径,那就是,在获取不完整信息的前提下进行推测。

这种推测的成本不可小觑。在信息不足时,当事人在未来的类似纠纷中,极可能为不确定性付出额外的代价,因而采取更保守,或更激进的策略。而公众评价司法,也容易形成注重片段信息、情绪判断的路径依赖。

这样看来,一个悖论逐渐显现——边界收缩似乎降低表达和理解的成本,但可能显著提高“行动成本”与“信任成本”。司法公信力,因此可能受到影响。

成本识别的“漂移”

还可以看到一种更深层的困境:成本的识别不稳定。从法律经济分析的角度看,制度选择通常以“降低成本”为导向。但问题是,何种成本被考虑,何种成本被忽略,并非固定的,这些受到成本可见性的影响。

在审判信息边界上,表达、理解与评价成本,通过文书长度、阅读负担等方式,时常更易被看见、衡量。而行动成本与信任成本,则较隐蔽,它们分散在个体决策中,表现出很高的不确定性、很强的风险规避特征,更难被观察与测算。所以,制度决策的“兴趣”,也易集中于前三者,些许忽视后两者。

这便出现成本识别的“漂移”——一些成本被持续放大,另一些成本被不断稀释。不是成本本身发生变化,而是不同类型成本的注意度发生了结构位移。这种位移,还涉及注意力的分配。它会反向塑造制度改进的路径,使某些机制易被反复修正,另一些机制则可能长期停留在不显眼之处。也正因此,表面上,信息把控制制似乎更高效,但实际上,整体的系统性成本可能增加了。

这一困境意味着,关于审判信息边界的判断,仅依赖局部成本的衡量,应该是“只见树木”。不同类型成本间的关系,才是“森林”。

再追问:人们是否参考裁判?

相关的一个疑点是,即便边界已经敞开,当

事人与公众是否真的会参考这些裁判信息。根据经验,这并不确定。需要注意的是,许多情境中,人们的行动策略没有依靠对裁判理由的直接细致理解。

信息虽已可得,但行动者或许倾向、依赖转述,例如,媒体报道、他人经验,甚至某种流行叙事。还有就是,行动策略本身又嵌入了具体情境,比如,商业安排、社会关系或组织惯例。法律裁判可能不过是其中的一个参考。

当然,这并不意味着信息敞开没有意义,它可以通过间接路径发挥作用:先影响专业群体——如律师、法务的判断,再向更广泛的社会扩散。在这一过程中,当事人与公众某种程度上“自我消化”了理解成本。他们并不逐一阅读每一份裁判文书,而是依赖逐渐形成的专业理解网络。这个网络,既包含正式规则,也包含对规则的经验性认知。

我们还能发觉,如果原始信息的边界过度收缩,这一网络就可能基础不稳,误解与偏差,会在传播中放大。

回到边界

问题回到起点:审判信息的边界,应如何设定?

没人怀疑,当裁判审议会议时,边界的收缩有助于维持程序秩序。在裁判结果阶段,边界的敞开,则是支撑裁判说服力的必要条件。而关键难点,是如何组织边界内部的信息。比如,是否能够在呈现复杂性的同时提供清晰结构?是否能够在保留细节的同时凸显核心判断?是否能够让不同层次的读者都找到理解的路径?

边界或许不应是静态的线状,而应随阶段变化。从长远看,问题所涉及的,不仅是司法技术,还包括制度经验:在不确定与可理解之间,社会——请注意是社会——怎样划定可接受的边界。审判信息的边界设计,终究是一种社会治理自身不确定性的选择。

(作者系中国政法大学教授)

漫画/高岳

陶鑫良

前不久,笔者搭乘“维京伊敦号”邮轮开启了一段“亚非欧发现之旅”,航程历时60天,途经17个国家及26座城市。

南非是此行重点。一周之内,邮轮接连停靠理查兹湾、德班、库贾波(原名东伦敦)、吉科巴哈(原名伊丽莎白港),开普敦五座南非城市。这场南非深度之旅,除探访好望角等知名自然景观,我也听闻不少当地风土轶事。在那天往返开普角、好望角的途中,一则颇具趣味的南非SABC电视许可证制度及其执行故事,引发了我的思考。

独树一帜

SABC是South African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(南非广播电视公司)的缩写,其于1936年依据议会法案设立,是南非法定国家级公共广播机构,运营延续至今。依据南非《1999广播法》及配套《电视许可证管理规章》,SABC自2016年起推行电视许可证制度并沿用至今,其核心规则可概括为:看电视先行登记办证,逐年按期缴费,违规依法追责。

不同于全球多数国家“基础电视节目免费收看,付费频道自愿订阅”的模式,南非相关法规确立了独特标准:只要家庭或单位配备能够接收广播电视信号的电视设备,无论设备是否实际开机收看,是否长期闲置,即便只使用网络流媒体而不实际使用电视设备,所有者都必须申领电视许可证并按年缴费。判定标准只看设备是否存在,与实际使用情况无关。

纳入管控范围的设备包含传统显像电视机、智能液晶电视、搭载电视调谐接收模块的电脑与显示器,以及所有原具备地面无线广播电视接收功能的电子设备。制度同时明确简化规则:一处居所,一家单位仅需办理一张年度许可证,屋内即便有多台收视设备,也无需重复办证;仅使用纯流媒体,未配备任何电视接收设备的家庭和机构,则免于登记缴费。

以现行标准为例,许可年费设有不同缴纳方案:年度一次性缴纳265兰特(约合人民币109元);选择按月缴纳,每月28兰特,全年合计336兰特(约合人民币138元);老年人、低保群体可享受优惠,全年仅需缴纳74兰特(约合人民币30元)。

这项电视许可制度在全球广电规制中独树一帜,收缴所得全部划入公共广播专项资金,用于本土电视节目、新闻内容创作、非洲特色内容生产以及偏远乡村信号覆盖,支撑SABC旗下五套电视频道、十余座广播电台运转,保障南非11种官方语言广播电视节目持续播出。

欠费故事

南非对电视许可证逾期欠费设置了完整且严厉的追责机制。其一,到期未续费每月加收10%罚息,罚息年度上限为本金额度,欠费满一年,欠款总额直接翻倍。其二,连续欠费3个月以上,相关账户移交第三方机构,通过短信、电话持续催告。其三,催告无果后,由SABC法务部门向地方法院提起小额诉讼。其四,地方法院向当事人邮寄正式法庭传唤传票,要求当事人在指定日期出庭应诉。其五,庭审中当事人无法提供合法免缴依据,法官可判令补缴本金与罚息。情节严重者,最高可处500兰特(约合人民币205元)罚金或处最长6个月监禁。

在南非,每年有数万名民众收到电视许可证欠费传票,当地法院年均审理上万起同类小额诉讼,衍生出诸多令人感慨的真实案例。

一对德国退休夫妻乘船抵达开普敦,在十二门徒峰附近租住滨海公寓一年,公寓留有房东遗留的智能电视。老夫妇日常只观看流媒体,从未收看广播电视,认为无需办理手续。租期结束后直接返回德国。半年之后,二人在家收到南非法院跨境邮寄的英文传票。SABC主张,

房屋内存在可接收地面广电信号的装置,住户无论是否收看公共频道都应当持证缴费,要求补缴年费、罚息以及诉讼费用。夫妻俩只能远程转账结清款项、申请撤诉,徒增诸多麻烦。当地旅游从业者提醒外国游客:长期租房内如有电视设备,由承租人承担电视许可证缴费义务。

在库贾波,一名独居老人几年前卖掉了电视机,却未办理许可证注销手续。系统持续自动计收年费并叠加罚息,多年累积欠款达1400兰特(约合人民币576元)。催收多次无果后,案件进入司法程序。庭审中,老人提交当年出售电视的凭证,证实住所中早已无相关电视设备,法官最终免于全部欠费与处罚。

南非知名喜剧演员特雷弗·诺亚多年前移居海外,南非居所内早已没有电视,但因他早年注册的电视许可证账号未注销,就常年收到催缴短信和资产扣押警告。有人调侃说,接到南非法院最神奇的出庭通知,就是忘了交电视许可证费。

质疑不断

随着流媒体平台快速普及,大众收视习惯持续转化,南非电视许可证制度的合规缴费率也不断下滑。譬如法律条文仍有监禁处罚,但在司法实践中,法院早已不再适用;此类案件多数以当庭结清欠款并酌情免除罚金了结。

目前,南非家庭按时交电视许可证费者越来越少;南非国内外各界也纷纷质疑,认为相关法规已然过时。南非通信部计划在2027年至2028年启动广播法修订工作,这项运行多年的电视许可证制度,或将迎来终结。

邮轮上六天的南非行程告一段落,下一站是纳米比亚的吕德里茨。站在甲板之上,我望着渐渐远去的开普敦海岸线,心中依然回味着南非这套特殊的电视许可证制度。

(作者系上海大学知识产权学院名誉院长)

漫画/高岳

袁了凡在宝坻的为政之道

做好一任地方官,既要公正处理已经发生的争议,也要兴利除害,使百姓能够安居乐业。这正是袁了凡将劝善之心落实于地方治理的具体实践

李德嘉 张月鑫

提起袁了凡,人们首先想到的往往是他所撰写的《了凡四训》,这部家训使袁了凡成为中国传统劝善文化中广为人知的人物。相比之下,他曾出任宝坻(今天津市宝坻区)知县的经历,却较少受到关注。其实,袁了凡不仅教如何修身立命,还在宝坻任内整顿吏治、清理狱讼、兴修水利、劝课农桑,不仅造福一方百姓,而且留下了丰富的为政经验。

袁了凡,名黄,浙江嘉善人,早年一度深信人的祸福吉凶皆由命数决定。后来,他在南京栖霞山参访云谷禅师,受到佛教禅修与传统劝善文化的深刻影响,逐渐认识到,人可以通过反省改过、积德行善改变自己的命运,于是自号“了凡”,勉励自己摆脱宿命论运播的凡夫见解,通过每日行善改过重新把握自己的人生。此后,他不仅时时以功过检点言行,也把仕宦为官府为践行这一信念的重要途径。

传统社会有“公门中好修行”的说法,意思是做好官、办实事,本身就是一种修行。身处官府,手握实权,一项决定可能使无辜百姓蒙冤受屈,也可以通过释冤解困、兴利除弊造福一方乡民。袁了凡在宝坻的施政,正是把个人修身转化为为政责任,把劝人向善落实为整顿吏治、慎刑劝善和兴利惠民的具体行动。这些为政经历,后来被较为完整地保存在《宝坻政书》之中。透过这部政书,人们看到的不只是撰写了《了凡四训》的劝善者,更是一位在日常政务中躬身行善的地方官。

正己察吏:为政先从整顿县衙开始

袁了凡刚到宝坻时,遇到过一件很有意思的事。袁了凡到任以后,将词状都收存在大堂,不让书吏随意拿走。所谓词状,就是古代百姓到衙门打官司所递交的诉状。可是没过多久,各房书吏便一起来请求,说这些词状本应由各房分别办理,放在大堂反而耽误公事。袁了凡听后觉得有理,便将词状交还给他们。让人没有想到的是,一个多月以后,书吏们又来请求袁了凡把词状收回大堂。这又是为什么呢?原来,袁了凡劝政爱民,百姓有了冤屈,可以直接到堂上陈述,他随到随问,随问随办。书吏即使拿到了词状,也没有机会从中拖延、把持,更难借机向百姓索取钱财。这样一来,词状留在各房反倒成了一件麻烦事,于是书吏们只好主动将它们送了回来。

这个故事看起来只是词状保管的问题,背后却关系着明代州县衙门如何运转的大事。古代一县只有知县一位主官,而钱粮、赋役、诉讼、刑狱等大量事务,都要由各房书吏具体经办。书吏熟悉程序,掌握文书,本来是知县处理政务的左膀右臂。如果知县疏于政务,百姓的诉求能否上达,案件何时办理,这时书吏就有很大的话语权。原本帮助官员办事的书吏,也可能变成隔在官员与百姓之间的一道关卡。

袁了凡治吏,并没有只靠训斥和惩罚。他所采取的办法,说来也很简单:知县自己勤于听理诉讼,百姓遇事能够直接陈述,书吏自然就失去了上下其手的空间。后来编订《宝坻政书》的人评价他“正己率物,取吏以诚,不察察为明,不琐琐为苛”。意思是说,袁了凡并不故意装出精明苛刻的样子,而是先把自己的事情做好,再以自己的行为约束属吏。

更能体现袁了凡治吏特点的是,他把功过格的方法用到了为官治吏之中。所谓功过格,就是将每天所做的善事和过失分别记录下来,按照一定标准计算功过,以此督促自己反省改正。袁了凡早年接受云谷禅师教导以后,便长期用这种办法检点自己的言行,做了官以后,他又将个人修行的方法转化为一套适用于基层官吏的具体履职标准。

在袁了凡所作的《当官功过格》中,官员为百姓中宽冤枉、平息争讼,可以记功;催征钱粮能够讲求方法、不滥用刑罚,也可以记功。相反,无罪而误加责罚、受人请托而枉法,因一时愤起随意用刑,都要记过。袁了凡相信,为善与为政并不是两回事。一个官员能否认真受理百姓的词状,能否避免滥施刑罚,能否约束书吏侵扰百姓,既关系县政得失,也决定着在每日的政务中是积功还是造过。

慎刑劝善:让犯过之人改过自新

袁了凡处理案件有一个鲜明特点,就是慎刑。《宝坻政书》记载,他有时整日不答打一人,整月不拟定一项罪名;县衙里的刑具,也都依照法律重新检验改正。遇到百姓犯罪,他并不急于用刑,而是反复讲明道理,希望犯过之人真正认识过错,悔悟自新。这样的做法并不意味着袁了凡一味宽纵。古代州县官员既负责审判,也直接掌握笞杖、枷押等权力。一旦官员性情急躁,或者轻信书吏、衙役之言,百姓就可能因一时之怒而遭受刑罚。因此,袁了凡所说的慎刑,首先就是要求官员克制自己:能不用刑便不用刑,必须用刑时,也不能超过应有的限度。

更有意思的是,袁了凡还会亲自走进监狱,向囚犯讲解“为善得福、为恶得祸”的道理。有些囚犯听后深受触动,甚至当场流泪。他并不把监狱只看作关押和惩罚人的地方,而是希望那些已经犯罪的人仍能保持良知,从此弃恶从善。据记载,万历

十七年秋天遭遇水灾时,监狱围墙倒塌,狱中重囚相互告诫,守法自持,竟没有一人趁乱逃走。袁了凡将劝善的方式融入罪犯改造,其实是以民间普遍接受的做法践行儒家“明刑弼教”的理念。

兴利惠民:让荒滩变成良田

袁了凡来到宝坻以后,发现当地东南一带地势低洼,土壤盐碱,大片土地长期荒芜。百姓守着土地,却很难从土地中得到足够的收成。这个问题应该怎样解决呢?从一片盐碱荒滩到一方稻田,袁了凡所做的,看起来只是改变了一种耕作方法,实际上却改变了不少百姓的生计。做好一任地方官,既要公正处理已经发生的争讼,也要兴利除害,使百姓能够安居乐业。这正是袁了凡将劝善之心落实于地方治理的具体实践。

《宝坻政书》中称赞袁了凡为“吾邑二百年未育之良牧也”。这样的评价并非空泛的溢美之词。从《宝坻政书》中的记载可以看到,袁了凡在宝坻的为政之道,说到底,就是把劝人向善的道理用来约束自己,再落实为整顿吏治、慎刑恤民和兴利惠民的实际行动。人们从《了凡四训》中认识了讲述立命之学的袁了凡,而《宝坻政书》则让我们看到一个相信“命由我作,福自己求”的人,如何在各县之地躬身实践,为百姓办成一两件实事。

(作者单位: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)

漫画/高岳

漫谈南非的SABC电视许可证制度

在南非,每年有数万名民众收到电视许可证欠费传票,当地法院年均审理上万起同类小额诉讼,衍生出诸多令人感慨的真实案例

陶鑫良

前不久,笔者搭乘“维京伊敦号”邮轮开启了一段“亚非欧发现之旅”,航程历时60天,途经17个国家及26座城市。

南非是此行重点。一周之内,邮轮接连停靠理查兹湾、德班、库贾波(原名东伦敦)、吉科巴哈(原名伊丽莎白港),开普敦五座南非城市。这场南非深度之旅,除探访好望角等知名自然景观,我也听闻不少当地风土轶事。在那天往返开普角、好望角的途中,一则颇具趣味的南非SABC电视许可证制度及其执行故事,引发了我的思考。

独树一帜

SABC是South African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(南非广播电视公司)的缩写,其于1936年依据议会法案设立,是南非法定国家级公共广播机构,运营延续至今。依据南非《1999广播法》及配套《电视许可证管理规章》,SABC自2016年起推行电视许可证制度并沿用至今,其核心规则可概括为:看电视先行登记办证,逐年按期缴费,违规依法追责。

不同于全球多数国家“基础电视节目免费收看,付费频道自愿订阅”的模式,南非相关法规确立了独特标准:只要家庭或单位配备能够接收广播电视信号的电视设备,无论设备是否实际开机收看,是否长期闲置,即便只使用网络流媒体而不实际使用电视设备,所有者都必须申领电视许可证并按年缴费。判定标准只看设备是否存在,与实际使用情况无关。

纳入管控范围的设备包含传统显像电视机、智能液晶电视、搭载电视调谐接收模块的电脑与显示器,以及所有原具备地面无线广播电视接收功能的电子设备。制度同时明确简化规则:一处居所,一家单位仅需办理一张年度许可证,屋内即便有多台收视设备,也无需重复办证;仅使用纯流媒体,未配备任何电视接收设备的家庭和机构,则免于登记缴费。

以现行标准为例,许可年费设有不同缴纳方案:年度一次性缴纳265兰特(约合人民币109元);选择按月缴纳,每月28兰特,全年合计336兰特(约合人民币138元);老年人、低保群体可享受优惠,全年仅需缴纳74兰特(约合人民币30元)。

这项电视许可制度在全球广电规制中独树一帜,收缴所得全部划入公共广播专项资金,用于本土电视节目、新闻内容创作、非洲特色内容生产以及偏远乡村信号覆盖,支撑SABC旗下五套电视频道、十余座广播电台运转,保障南非11种官方语言广播电视节目持续播出。

欠费故事

南非对电视许可证逾期欠费设置了完整且严厉的追责机制。其一,到期未续费每月加收10%罚息,罚息年度上限为本金额度,欠费满一年,欠款总额直接翻倍。其二,连续欠费3个月以上,相关账户移交第三方机构,通过短信、电话持续催告。其三,催告无果后,由SABC法务部门向地方法院提起小额诉讼。其四,地方法院向当事人邮寄正式法庭传唤传票,要求当事人在指定日期出庭应诉。其五,庭审中当事人无法提供合法免缴依据,法官可判令补缴本金与罚息。情节严重者,最高可处500兰特(约合人民币205元)罚金或处最长6个月监禁。

在南非,每年有数万名民众收到电视许可证欠费传票,当地法院年均审理上万起同类小额诉讼,衍生出诸多令人感慨的真实案例。

一对德国退休夫妻乘船抵达开普敦,在十二门徒峰附近租住滨海公寓一年,公寓留有房东遗留的智能电视。老夫妇日常只观看流媒体,从未收看广播电视,认为无需办理手续。租期结束后直接返回德国。半年之后,二人在家收到南非法院跨境邮寄的英文传票。SABC主张,

房屋内存在可接收地面广电信号的装置,住户无论是否收看公共频道都应当持证缴费,要求补缴年费、罚息以及诉讼费用。夫妻俩只能远程转账结清款项、申请撤诉,徒增诸多麻烦。当地旅游从业者提醒外国游客:长期租房内如有电视设备,由承租人承担电视许可证缴费义务。

在库贾波,一名独居老人几年前卖掉了电视机,却未办理许可证注销手续。系统持续自动计收年费并叠加罚息,多年累积欠款达1400兰特(约合人民币576元)。催收多次无果后,案件进入司法程序。庭审中,老人提交当年出售电视的凭证,证实住所中早已无相关电视设备,法官最终免于全部欠费与处罚。

南非知名喜剧演员特雷弗·诺亚多年前移居海外,南非居所内早已没有电视,但因他早年注册的电视许可证账号未注销,就常年收到催缴短信和资产扣押警告。有人调侃说,接到南非法院最神奇的出庭通知,就是忘了交电视许可证费。

质疑不断

随着流媒体平台快速普及,大众收视习惯持续转化,南非电视许可证制度的合规缴费率也不断下滑。譬如法律条文仍有监禁处罚,但在司法实践中,法院早已不再适用;此类案件多数以当庭结清欠款并酌情免除罚金了结。

目前,南非家庭按时交电视许可证费者越来越少;南非国内外各界也纷纷质疑,认为相关法规已然过时。南非通信部计划在2027年至2028年启动广播法修订工作,这项运行多年的电视许可证制度,或将迎来终结。

邮轮上六天的南非行程告一段落,下一站是纳米比亚的吕德里茨。站在甲板之上,我望着渐渐远去的开普敦海岸线,心中依然回味着南非这套特殊的电视许可证制度。

(作者系上海大学知识产权学院名誉院长)

漫画/高岳

袁了凡在宝坻的为政之道

做好一任地方官,既要公正处理已经发生的争议,也要兴利除害,使百姓能够安居乐业。这正是袁了凡将劝善之心落实于地方治理的具体实践

李德嘉 张月鑫

提起袁了凡,人们首先想到的往往是他所撰写的《了凡四训》,这部家训使袁了凡成为中国传统劝善文化中广为人知的人物。相比之下,他曾出任宝坻(今天津市宝坻区)知县的经历,却较少受到关注。其实,袁了凡不仅教如何修身立命,还在宝坻任内整顿吏治、清理狱讼、兴修水利、劝课农桑,不仅造福一方百姓,而且留下了丰富的为政经验。

袁了凡,名黄,浙江嘉善人,早年一度深信人的祸福吉凶皆由命数决定。后来,他在南京栖霞山参访云谷禅师,受到佛教禅修与传统劝善文化的深刻影响,逐渐认识到,人可以通过反省改过、积德行善改变自己的命运,于是自号“了凡”,勉励自己摆脱宿命论运播的凡夫见解,通过每日行善改过重新把握自己的人生。此后,他不仅时时以功过检点言行,也把仕宦为官府为践行这一信念的重要途径。

传统社会有“公门中好修行”的说法,意思是做好官、办实事,本身就是一种修行。身处官府,手握实权,一项决定可能使无辜百姓蒙冤受屈,也可以通过释冤解困、兴利除弊造福一方乡民。袁了凡在宝坻的施政,正是把个人修身转化为为政责任,把劝人向善落实为整顿吏治、慎刑劝善和兴利惠民的具体行动。这些为政经历,后来被较为完整地保存在《宝坻政书》之中。透过这部政书,人们看到的不只是撰写了《了凡四训》的劝善者,更是一位在日常政务中躬身行善的地方官。

正己察吏:为政先从整顿县衙开始

袁了凡刚到宝坻时,遇到过一件很有意思的事。袁了凡到任以后,将词状都收存在大堂,不让书吏随意拿走。所谓词状,就是古代百姓到衙门打官司所递交的诉状。可是没过多久,各房书吏便一起来请求,说这些词状本应由各房分别办理,放在大堂反而耽误公事。袁了凡听后觉得有理,便将词状交还给他们。让人没有想到的是,一个多月以后,书吏们又来请求袁了凡把词状收回大堂。这又是为什么呢?原来,袁了凡劝政爱民,百姓有了冤屈,可以直接到堂上陈述,他随到随问,随问随办。书吏即使拿到了词状,也没有机会从中拖延、把持,更难借机向百姓索取钱财。这样一来,词状留在各房反倒成了一件麻烦事,于是书吏们只好主动将它们送了回来。

这个故事看起来只是词状保管的问题,背后却关系着明代州县衙门如何运转的大事。古代一县只有知县一位主官,而钱粮、赋役、诉讼、刑狱等大量事务,都要由各房书吏具体经办。书吏熟悉程序,掌握文书,本来是知县处理政务的左膀右臂。如果知县疏于政务,百姓的诉求能否上达,案件何时办理,这时书吏就有很大的话语权。原本帮助官员办事的书吏,也可能变成隔在官员与百姓之间的一道关卡。

袁了凡治吏,并没有只靠训斥和惩罚。他所采取的办法,说来也很简单:知县自己勤于听理诉讼,百姓遇事能够直接陈述,书吏自然就失去了上下其手的空间。后来编订《宝坻政书》的人评价他“正己率物,取吏以诚,不察察为明,不琐琐为苛”。意思是说,袁了凡并不故意装出精明苛刻的样子,而是先把自己的事情做好,再以自己的行为约束属吏。

更能体现袁了凡治吏特点的是,他把功过格的方法用到了为官治吏之中。所谓功过格,就是将每天所做的善事和过失分别记录下来,按照一定标准计算功过,以此督促自己反省改正。袁了凡早年接受云谷禅师教导以后,便长期用这种办法检点自己的言行,做了官以后,他又将个人修行的方法转化为一套适用于基层官吏的具体履职标准。

在袁了凡所作的《当官功过格》中,官员为百姓中宽冤枉、平息争讼,可以记功;催征钱粮能够讲求方法、不滥用刑罚,也可以记功。相反,无罪而误加责罚、受人请托而枉法,因一时愤起随意用刑,都要记过。袁了凡相信,为善与为政并不是两回事。一个官员能否认真受理百姓的词状,能否避免滥施刑罚,能否约束书吏侵扰百姓,既关系县政得失,也决定着在每日的政务中是积功还是造过。

慎刑劝善:让犯过之人改过自新

袁了凡处理案件有一个鲜明特点,就是慎刑。《宝坻政书》记载,他有时整日不答打一人,整月不拟定一项罪名;县衙里的刑具,也都依照法律重新检验改正。遇到百姓犯罪,他并不急于用刑,而是反复讲明道理,希望犯过之人真正认识过错,悔悟自新。这样的做法并不意味着袁了凡一味宽纵。古代州县官员既负责审判,也直接掌握笞杖、枷押等权力。一旦官员性情急躁,或者轻信书吏、衙役之言,百姓就可能因一时之怒而遭受刑罚。因此,袁了凡所说的慎刑,首先就是要求官员克制自己:能不用刑便不用刑,必须用刑时,也不能超过应有的限度。

更有意思的是,袁了凡还会亲自走进监狱,向囚犯讲解“为善得福、为恶得祸”的道理。有些囚犯听后深受触动,甚至当场流泪。他并不把监狱只看作关押和惩罚人的地方,而是希望那些已经犯罪的人仍能保持良知,从此弃恶从善。据记载,万历

十七年秋天遭遇水灾时,监狱围墙倒塌,狱中重囚相互告诫,守法自持,竟没有一人趁乱逃走。袁了凡将劝善的方式融入罪犯改造,其实是以民间普遍接受的做法践行儒家“明刑弼教”的理念。

兴利惠民:让荒滩变成良田

袁了凡来到宝坻以后,发现当地东南一带地势低洼,土壤盐碱,大片土地长期荒芜。百姓守着土地,却很难从土地中得到足够的收成。这个问题应该怎样解决呢?从一片盐碱荒滩到一方稻田,袁了凡所做的,看起来只是改变了一种耕作方法,实际上却改变了不少百姓的生计。做好一任地方官,既要公正处理已经发生的争讼,也要兴利除害,使百姓能够安居乐业。这正是袁了凡将劝善之心落实于地方治理的具体实践。

《宝坻政书》中称赞袁了凡为“吾邑二百年未育之良牧也”。这样的评价并非空泛的溢美之词。从《宝坻政书》中的记载可以看到,袁了凡在宝坻的为政之道,说到底,就是把劝人向善的道理用来约束自己,再落实为整顿吏治、慎刑恤民和兴利惠民的实际行动。人们从《了凡四训》中认识了讲述立命之学的袁了凡,而《宝坻政书》则让我们看到一个相信“命由我作,福自己求”的人,如何在各县之地躬身实践,为百姓办成一两件实事。

(作者单位: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)

漫画/高岳

漫谈南非的SABC电视许可证制度

在南非,每年有数万名民众收到电视许可证欠费传票,当地法院年均审理上万起同类小额诉讼,衍生出诸多令人感慨的真实案例

陶鑫良

前不久,笔者搭乘“维京伊敦号”邮轮开启了一段“亚非欧发现之旅”,航程历时60天,途经17个国家及26座城市。

南非是此行重点。一周之内,邮轮接连停靠理查兹湾、德班、库贾波(原名东伦敦)、吉科巴哈(原名伊丽莎白港),开普敦五座南非城市。这场南非深度之旅,除探访好望角等知名自然景观,我也听闻不少当地风土轶事。在那天往返开普角、好望角的途中,一则颇具趣味的南非SABC电视许可证制度及其执行故事,引发了我的思考。